

清明节前后,富春庄外,山野中的竹笋开始争先恐后钻出地面。人行道一边靠着低矮的丘陵,茂林修竹,植物的叶子一天一个颜色,几天就会往上长一丛,最快的自然是笋了。各种笋,是春天野蚕生长的主要力量。

早餐后,我照例在庄里巡视一番。突然,小门边墙角的夹角区域,出现了两枝矮矮的身影,淡黄的身材,矮矮的,似乎有点害羞。看着姐妹俩,一阵惊喜,庄外围墙皆是淡竹,竹林间的小笋也已参差不齐,庄内有百余种植物,但唯独没有竹,而今天早晨,两位竹的小天使从地而出。惊喜过后,我又沿着围墙,仔仔细细地转了一圈,墙角除了茂盛的月季与玫瑰外,再没有发现笋的足迹。

养小日子新鲜,我不养,我看。我知道,要不了多久,她们就会亭亭玉立的。此后数日,只要在庄里,我每天都会巡视墙角,看有没有新的小笋出现,一直没有发现新长的笋。基本确定,今年的竹客,估计只有这姐妹俩了。

这几天正在最后润色《昨非非》书稿,自然一下子就想起了袁昶。袁昶从小就生长在富春江边,桐君山边,喜欢种植,故他对种植法特别关注。光绪元年(1875)五月,袁昶的日记摘录了南宋林洪《山家清事》中的种竹法:八月八日为竹醉日,种竹易活。

袁昶接着感叹:我的生日就是八月八日,难道我的前身就是竹子吗?林洪的《山家清供》二卷,我早就细读过,他的书基本上是写山野所产蔬菜、水果、动物等,还有食材特点、烹制方法,间以诗文掌故。而《山家清事》一卷,所谈之事,俗雅相间,将种竹、插花、酒具、相鹤、泉源、诗筒、食豚等皆列入清事范畴。

## 庄客

陆春祥

其中种竹法原文为:《岳州风土记》《文心雕龙》皆以五月十三日为生日,《齐民要术》则以八月八日为醉日,亦为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园丁曰:“种竹无时,认取南枝。”又曰:“莫教树知,先锄地,令松且阔沃,以渠泥及马粪急移竹,多带旧土,本者种之,勿踏以足。若换叶,姑听之勿遽拔去。”又有二秘法:迎阳气,则取季冬;顺土气,则取雨时。若虑风,则去稍而缚架,连数根种,则易生笋。过此谓有他法者,难矣哉!

《文心雕龙》为南朝梁的刘勰所著,《岳州风土记》的作者是宋代的范致明,他们都将竹子最易成活的日子定为五月十三,个中原因或许是春夏之秋,万物萌生,种植成活率高。但八月八日的说法也不是林洪的原创,而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的。林洪认为他们的说法皆可疑。他有老园丁的经验可证:种竹什么时间都可以,只是要选取南枝。为什么呢?南枝向暖北枝寒嘛。老园丁还有更具体的种植法,说不要去惊醒竹子,其实就是现在移大树的根部大法,将竹子周边生长的旧土多挖些,在要种竹子的新地方,挖深些,先埋进河泥及马粪,迅速移种,不要用脚踩实。老园丁还有种竹秘诀:阳光、地气、晴雨、风向都要考虑,如此,竹子才易成活,多长笋。

而我什么力气也没花,就白白地收了两根淡竹。出差一周回来,进庄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那对姐妹俩。噢,已经超过围墙的高度了,甚至比墙外的竹子还高一些,一节一节,似乎每一节都在进

行拔节比赛。我知道,这两位客人不简单,当初建围墙时,墙至少有八十厘米深、三十厘米宽,也就是说,它们得深入地下八十厘米,再穿过长长的地下隧道,才能成为庄里的成员。亲爱的小笋笋们,你们太强了,我爱你们。

由竹联想到树木的种植。自古以来,各种树木的种植,其实都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种养相辅相成,但中国地广,南北东西环境差异极大,又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千百年来,自然形成了丰富的经验,种松如此,种竹也如此。不过,从读书的角度言,读书人各取所需,同样的素材,各有发挥,袁昶借竹有醉日,叙事生发自己所感,颇有新意。人生如果有醉(酒喝醉除外),至少可以暂时忘却一些烦恼吧。我呢,只是感叹竹子生命力的顽强。

我知道,这两位富春庄的特别客人,待夏日来临,它们就会如围墙外的那些成年淡竹一样了,临风而立,摇出各种姿态。不过,在今后的日子里,它们更将栉风沐雨,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期望,它们在富春庄无拘无束,肆意生长,并在明年带给我更多的惊喜。

4月29日早上还是阴雨大风,没想到过了下午三点,天空放晴,给了我们明媚的夕阳。我们是受月季园园长陈丹燕的年度之邀来辰山植物园赏花的,或者应该说是以玫瑰之名精神性地环游世界。

从2020年至今,陈丹燕带我们认识了这片被湖水环抱的花岛,让我们爱上了这座荣获“世界月季名园”美誉、极具人文气息的花园,为我们在疫情中找到一个在地的目的地。上一次,她携手著名翻译家在这里为一株月季命名“翻译家”,这次,她邀请我们来隆重迎接古老的本土品种“花地”——

那是一株瘦弱的粉色半重瓣月季,挨过了南方雷暴,以及雷暴中的航行,被摄影师彭永坚像怀抱婴儿那样呵护了一路,终于从广州来到上海。去年秋天,陈丹燕、陈保平夫妇在广州花地遗址田野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这株古老的本土月季,拍照留念。

经过梳理史料,我们会发现盛行欧洲的粉色玫瑰可以溯源到广州。可考证的是,在英国园艺家斯蒂芬·梅恩、哈克斯顿,东印度商船上的牧师欧斯贝克,邱园植物园前任园长威廉·艾顿等诸多人士的努力下,触感如丝绸、可重复开花的中国粉色月季传入欧洲,从瑞典到英

国到法国,被称为“月月粉”“老腮红”。

据说1823年时,它已出现在英国的村舍花园里,也出现在1824年比利时植物学家和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特绘制的《帕森斯的中国粉彩》、1818年出版的查尔斯·马洛的专著《玫瑰的历史》等书画典籍中。这是一个多产的亲本,现在栽培的所有月季几乎都是它的后代,

## 花与书的环球旅行

于是

包括英国的“诺赛特的腮红”、法国的“波旁月季”和“第戎的荣耀”。亨利·安德鲁斯称之为“引入英国的最伟大的观赏植物之一”。

在辰山植物园月季园里的千余种月季里,“花地”是辰山第一次命名的发现月季——作为一个品种,这指的是古老却已经失名的月季。作为一个物种,它有它的环球旅行。

书和花一样,有自己的环球旅行,需要爱花、爱书的人。这场雅集茶会名为“玫瑰的名字”,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协办单位,带来了许多滋养过读者和旅行者的经典文学译作,最亮眼的是《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者丹穆若什教授在2020年疫情暴发后取消了旅行,每天在线发布一篇文章,讲述一部文学经

典,在十六个星期内完成了一次环球文学之旅。

这和茶会有着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因为陈丹燕的文学乐园正是受了世界文学的滋养才一年地盛大起来的,在二十多年的世界旅行中,她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地理阅读、写作和影像。这片花园里共安置了60个声音故事,只需扫描二维码,便能听到陈丹燕亲手讲述、亲自念诵的她和月季的故事,她对月季的理解。

为了2024年的这场月季茶会,陈丹燕还将2020年开始积累至今、持续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律令》展现在辰山植物园大厅,书架、脚踏车、手绘地图、明信片、口罩里的鲜花、完成壮游任务的板鞋、园艺手套……每一件物件都能唤起我们对天地律令的深思,这种经历对于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师来说是必须书写的主题。

花和书相映成辉的夕阳里,我们作为“月季岛主”的客人是极受优待的——原来,要待暮色微凉时,才到了月季芳香最烈的时段,仿佛所有的花都在阳光退去后热烈而沉默地呼唤。花是属于大自然的,也属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历经四年,文化园长陈丹燕确立了这座花园的文化属性。

我特意去看了看“翻译家”,刚有花骨朵,还有一周才能开,这不禁让人莞尔——翻译确实要比原著来得晚,你看原著中常见的朱丽叶、玛格丽特、白雪公主……都已成熟。



## 会送花的小狗

刘琪瑞

昨天我又到郊外溜达,转悠到一处圈满枫树篱笆的园子旁。园子里有两株虬曲盘旋的紫藤,一串串紫藤花垂挂下来,像紫色的流云,更像紫色的瀑布。园门紧闭,我进不去,只能在园外探头探脑观看。

园子里有两只小狗,见我窥视,汪汪大叫。我讨好似的轻唤着,它们不理我,仍然狂吠不止,我想要是有鸡骨头、猪骨头就好了,投给小狗,换得它们片刻安宁,我好安静地看花。我同小狗们商量:“我不是歹人,不会偷你们家东西,一根草也不拿,我就在院外看一看紫藤花,嗅一嗅花香好吗?”

狗叫声惊动了小园主人,我以为没有人呢,刚才的一番话,是不是他听见了?那汉子冲我笑了笑,一脸阳光,走过来掏出钥匙,打开反锁的门,热情地邀我进去。我自嘲地说:“嘿,我以为小狗当家呢,正和它们商量让我看看紫藤花,两只小狗好像不乐意,吵着赶我走,它们可真尽职啊!”

憨实的主人当了真,忙说:“一回生二回熟,你下回再来,它们就不咬你了,会冲你摇尾巴,还会衔上一枝石榴花送你呢!”“那敢情好,下次我一定来,就冲着你的狗儿送我石榴花!”这是多美的憧憬啊!

每当我读日本著名山水画家、散文家东山魁夷的画作《白桦林》时,总是感到似曾相识。“五一”前夕,踏青归来,突然想起上世纪曾风靡上海文坛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想起他家中墙上的那幅油画,同时心生遗憾——他在1998年5月9日辞世,还不到70岁。

1994年“五一”前夕的一个下午,在《立功竞赛》杂志编辑王仁华的牵线和陪同下,我们赴香花桥路胡万春的居处,拜访了他。胡万春在书房接待了我们。仿红木的大书橱和大书桌对面,是一张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胡万春的大照片。一侧,是一只不小的保险箱。

“这是西湖龙井,新茶。”胡万春端着托盘,托盘上,是三只茶杯。在茶香中,我们开始了互动。

1954年,25岁的胡万春以短篇小说《骨肉》登上

## 想起工人作家胡万春

丁旭光

文坛。《骨肉》以工人的立场和视角,讲述了抗日战争前后资本家放高利贷剥削工人的故事。因《骨肉》而一举成名的胡万春,陆续在各大刊物上发表文章达数百万字,出版小说、电影、话剧、理论等二十几部。1957年,《骨肉》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文学奖。

胡万春的个人经历富有传奇性:1956年,弃工从文;1965年,弃文从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下海经商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胡万春在1985年,弃文从商。

一次,上海作家协会一批会员外出采风,途中,有一位语出尖锐:“老胡,你的作品曾经教育过整整一代人。你写的《骨肉》反映社会工人受压迫受剥削造成骨肉分离的悲惨生

活,我读了很感动。如今,你却成了资本家,你让我相信过去的你?还是相信今天的你?”胡万春认为这位的观念仍停留在“穷革命”“富变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旧概念上。他当年写《骨肉》,是揭露旧社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和矛盾。

胡万春之所以成为那位眼中的“资本家”,是因为开了两家书店。为了给一些作家排忧解难,胡万春先后拿出14万元人民币,在上海开了两家书店,很快为一百多位作家和学者代销包销了他们自己难以处理的书籍。虽然两家书店并没有为胡万春带来利润,但他却非常高兴。有记者采访胡万春:“你开书店的资金是做生意赚的吗?”“不,都是稿费收入。”

从1950年到1965年,胡万春的稿费收入达六位数,在那个年代可谓天价。新时期以来,胡万春的稿费继续在上海的作家中领先。他每一部作品的印数都很多。而且,几乎每一部都可以拿三到四次稿费:发表一次、出书一次,改编成影视作品一次,有的作品还在国外出版。

既然不赢利,为何还要开两家书店呢?胡万春说:“如果十一亿中国人都只看娱乐性、趣味性方面的书,国民文化素质将大大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在胡万春为我们续茶时,我的视线转到对面的墙上。墙上是一幅油画。画面上,些许伐木工人在曙光升起的时候,在淡淡的炊烟中,踏着积雪,走向白桦林的深处……



青春中国 (篆刻) 吴伦仲 神采飞扬

三十五年前初抵悉尼,租在一套单身公寓里。房东就住隔壁另一幢楼,上下三层,只有她一个。她太老了,老到腰身快要对折,老到双眼几乎消失在千百条皱纹里,以致不敢相信她曾年轻过,直到去交房租时,看到客厅高挂的黑白照片上那位含娇含羞的可人儿,才明白时光可以多么残酷。

满屋是经年沉积的黄油和洋葱味,紫雾般的暗影里,她正准备一个人的晚餐,桌上铺着红白格子桌布,与外国电影里看到的,一般无二。我心里暗暗稀奇,看来西洋人就餐委实讲究,无桌布,不成餐,哪怕只一个人,哪怕老到快成化石了,也不嫌费事,情愿事后去洗濯、晾晒、熨烫。

那个年代,悉尼老一辈的西餐桌上,普遍有桌布的存在。出入过几户相熟的人家,大都能见到。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和希腊移民家庭里尤其多见,似乎移民社区的习俗,更趋老派一些。我那位房东,是罗马尼亚移民,原是未代

贵族,革命政权成立时,仓皇逃了出来。现在落魄在悉尼,排场自然无存,做派还依旧,周日要上教堂,出门要穿正装,吃饭自然少不了桌布。一般而言,但凡顶着霜雪鬓发,衣履齐整,出入教堂,家住维多利亚式、联邦式、加利福尼亚式老房子的西人,基本都是桌布一派。进餐时,不仅桌布是必不可少的,碰到隆重的场合,干脆灯也不开,直接用蜡烛照明。

凡此种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似乎自找麻烦,但他们从小习惯了,餐台若不铺上桌布,与床垫上不铺床单无异,用英国话说,感觉很bare,意思是空落落的,像没穿衣服。

正因如此,桌布与床单一样,在各家百货公司里,也算一个主要的商品门类,自然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我到悉尼后,找的第二份工作,便是在一家桌布进口商。公司从中国进口针织的钩花

桌布,各色各款,打成巨大的包,堆在仓库里。我的工作,是在弥漫的蒸汽里,与一群澳洲大妈一起,将一幅幅桌布熨平,折叠,独立包装好,按订单装箱,发往各大百货公司。问下来,每个大妈工友,都曾以极低的员工价,买过桌布自用,或馈赠亲友,可见使用桌布还是挺普遍的。

至于颠沛中的我,碍于心境,遗憾未能效颦,吃饭时,对着光秃秃的桌子,心里暗付,或许哪天也会像西人那样,铺上桌布,像样吃它一餐。可直至今日,从悉尼一路折腾到北京,到上海,也没养成用桌布的习惯。事实上,悉尼的大多数数人家庭,即便不会中国话的土生华人,也极少用桌布。华人用桌布最多的地方,是广东茶楼,为的是替圆台面遮丑,盖住那些油渍斑斑的裸露木屑板。

而在白人中间,新一代里头,桌布也日趋式微。生活方式已经天翻地覆了,单身青年往往与人合租,小家庭的住所多亦挤迫,在外吃快餐,就成了主流。回到住处,往往以预制食品或半成品果腹,要的就是简便。倘若还去张罗铺桌布、洗桌布,岂不与从简的初衷背道而驰?不过,碰到重要些的场合,桌布还是不可或缺的,但味道却变了。在另一份工作中,我曾与同事赴澳洲区总经理家宴,见餐具酒具皆华美,桌布的品质,也堪称上乘,却听总经理抱歉说,今天吃饭,没有采用fine dining(优质餐饮)标准,没有铺桌布,用的是一次性的纸桌布,请大家多包涵。手里摸着仿真性极高的纸桌布,终于意识到,桌布的时代,是真的过去了。

在这样的饮食文化润物无声的浸润下,福建人的餐桌主打的就是一个山海交响。请看明

## 十日谈

餐桌的氛围 责编:刘芳